极化、宏观政策变动与社会冲突
——来自拉美的实例

田艳芳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上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分析其国家历史发现,严重收入分化和经济社会分化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割裂和对立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极化,而收入分配不均正是极化的表现。政治极化使得绝大部分公共支出倾斜到非生产性领域,这进一步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社会冲突加剧、政权更迭频繁。本文引用一个有两个参与者的博弈模型,加入决策者的偏好极化,结合拉丁美洲的历史,证实了在收入两极化严重的社会中,公共资源过度分配和过度开发的可能性更大,大规模社会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更大。

关键词: 极化; 宏观政策变动; 社会冲突
中图分类号: D58; 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1000 - 579(2017)03 - 0045 - 07

Polarization, Changing of Macropolicy, and Social Conflicts
——A Case Study of Latin America

TIAN Yanf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most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ere stagnated in “Middle Income Trap”.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larization was the leading factor. The separation of sectors and groups amplified the polarization, which manifested by income gaps.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led most of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the non - productive areas, which brought great pressure on the economic macropolicy, and directly led to economic stagnation, intensifying the social conflicts, and frequent transfers of regimes. This paper takes a game model with two participants, adds with leaning polarization, combining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and proves that in the highly polarized soceity there is a greater chance that the public resources are overallocated and overexploited. Accordingly, the large - scale social conflicts might break out.

Key words: polarization; change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social conflicts

一、前言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与社会僵化》书中提到: 社会上大部分特殊利益集团

收稿日期: 2016 - 06 - 08
基金项目: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经济制度成因和化解机制研究”(编号: 15HZK026)
作者简介: 田艳芳(1981 -),女,河南鹤壁人,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的目的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这是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争夺国民收入的分配份额时,一部分人收益增加必然伴随着另一部分人收益减少,因此人民之间就产生矛盾。这样,当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分配矛盾显得格外突出时,政治上的分歧也会愈演愈烈。[1](p55-56) 丹尼斯·缪勒(Dennis Mueller)指出,由于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多而导致对分配问题的日益重视,即使所有选民的偏好不变,也可能使政治体系放弃它原来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分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上的多变,甚至会导致社会失控。[2](p545) 这些论述引出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矛盾、政治分歧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

极化会导致私人部门资本积累的低效,并永久性地降低资本存量和经济产出水平。因为决策者将稀缺的政府资源尽可能多地用在公共产品生产上,以最大化决策者自身的效用。在一个税收既定的社会,就会出现超出社会理性水平的过度支出,经济增长率也会降低到一个新的较低产出水平的稳态。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崩溃看似是由财政波动引起的,但根本原因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本文借鉴 Woo(2003,2005)[3][4] 的模型分析一个有两个参与者的博弈模型,加入偏好极化,在模型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拉丁美洲的历史,证实了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中,公共资源过度分配和过度开发的可能性更大,社会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更大。

二、极化引发宏观政策变动频繁

对长期增长问题的经验研究发现,收入分布上的两极分化不利于经济增长(Rodrik,1999)。[5] 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国家似乎更倾向于采用不利于增长的政策。例如,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常常导致巨额财政赤字、不稳定的财政结果和增长停滞。代表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经济团体在理想的公共政策上存在尖锐分歧,这很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协调失灵,进而导致采取个人理性但集体低效的政策。

长期以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都将极化作为解释民粹主义财政政策和不良宏观经济状况的关键因素。极化或许是政治经济文献中最早的思想之一,但是极化在集体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却鲜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本文基于简单的增长模型框架,借鉴 Woo(2003)[3] 模型建立一个财政政策的动态博弈模型,其中极化(指政府公共支出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分配偏好的两极分化)是导致财政不稳定以及增长倒退的核心原因。而极化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收入分配严重的不均等。

考虑有两个决策人共同代表财政部门控制财政政策。假定政府有权利将私人部门生产的消费品转换为公共物品 g_1 和 g_2。两个决策人用 i,j 表示,假定这两个决策人分别代表不同私人部门的利益。决策人 i 从政府收入中提供公共物品 g_i 给某个私人部门,决策人 i 从提供他偏好的公共物品 g_i 中获得的效用大于 g_j。因为两个人对两种公共物品有不同的偏好,并都寻求各自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当两者面临相同的政府预算约束时,每一方都要采取战略行动以最大化自己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量。

为描述这一内生财政政策决定过程,我们考虑一个可微博弈,两个决策人可以共同决定如何使用政府净收入,各自的效用来自所偏好的公共物品数量。

每一个决策人的目标函数如下:

$$V = \int_0^{\infty} [\lambda_i \log(g_{1t}) + (1-\lambda_i)\log(g_{2t})]\, e^{-rt} dt \qquad (1)$$

其中 $0 \leqslant \lambda_2 \leqslant \frac{1}{2} \leqslant \lambda_1 \leqslant 1$,假设决策人的贴现率等于利率。相较于 g_j 决策人 i 更偏好公共物品 g_i,$i,j = 1,2$。这意味着在效用函数中,决策人 i 给自己所偏好的公共物品 g_i 赋予了较大的权重。决策人 i 的权重 λ_i 与他所代表的集团内所有人一致,因此可以将 $\theta = \lambda_1 - \lambda_2$ 视为两个决策人之间偏好的两极分化程度。

再来考虑决策人所面临的政府预算约束。政府从私人部门征收一次性的税收 τ(假设每个集团的

代理人只有一个)。政府支出也可以靠发行债券来融资(固定真实利率 r),那么每一个时点上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dot{b} = rb + g_1 + g_2 - \tau \tag{2}$$

其中 b 是国债存量

每一个决策人 i,面临政府预算约束(2)和非庞氏博弈条件,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1)而控制变量 g_i。

假定政府净收入为 $R_t, R_t = \tau - rb_t$ (3)

线性策略为: $g_{it} = \chi_i R_t$ (4)

其中 χ_i 是内生决定的。假定策略集是 $\chi_i \in [0, \infty)$。令 $\psi_t = \log R_t$,可以将决策人的目标函数改写为:

$$V^i(\chi_1, \chi_2) = \int_0^{\infty} [\lambda_i \log(\chi_1) + (1 - \lambda_i) \log(\chi_2) + \psi_t] e^{-rt} dt \tag{5}$$

预算约束变为:

$$\dot{\psi}_t = r - r\chi_1 - r\chi_2 \tag{6}$$

纳什反馈均衡,即求约束条件(6)下的目标函数(5)的最大化。

可以求解出纳什反馈均衡为:

$$\chi_1^{\blacktriangle} = \lambda_1, \chi_2^{\blacktriangle} = (1 - \lambda_2); \text{因此 } g_{1t}^{\blacktriangle} = \lambda_1 R_t, g_{2t}^{\blacktriangle} = (1 - \lambda_2) R_t \tag{7}$$

极化程度越高的经济体,财政支出波动的程度也越大,我们可以用解 $g_1^{\blacktriangle}$ 和 $g_2^{\blacktriangle}$ 来阐述这点。使用(7),可以将时期 t 的总政府支出($\tilde{g}$)表示为:

$$\tilde{g}_t = g_{1t}^{\blacktriangle} + g_{2t}^{\blacktriangle} = (1 + \theta)(\tau - rb_t) \tag{8}$$

对于时期 t 的每一个时点,政府支出都与净税收($\tau - rb$)成正比。决策者根据每一时点的状况调整自己的行动。因此如果对这个等式求时刻 t_+ 的全微分,可以得到:

$$\frac{d\tilde{g}_{t+}}{d\tau} = (1 + \theta) \geqslant 1, \text{当 } \theta = 0 \text{ 时为等式} \tag{9}$$

由上式可以预测,当 $\theta > 0$,极化程度为正时,政府支出增加的比例要大于税收增加的比例。只要政府净收入遭受正(负)冲击,当存在极化时,都会造成政府支出水平更大比例的增加(减少)。$\tilde{g}$ 变化的绝对规模要大于 θ 的规模。一个极化更严重的经济体中政府支出的波动性更大。

组织为其成员谋福利有两条途径:第一,使全社会的生产增加,从而使其成员按原有份额取得更多的产品;第二,在原有的总产量内为其成员争取更大的份额。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了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份额。尤有甚者,即使社会利益重新分配所招致的损失超过该集团由此类分配所得的利益许多倍,仍会出现上述情况。

我们可以将上述结论与拉美一些国家财政周期性现象相联系。Gavin and Perotti(1997)详细记录了拉美国家这些显著可见的财政周期。[6](p11-61) 例如,繁荣期(衰退期),财政支出增加(减少)的幅度要超过税收变化的幅度,因此会造成这个时期的赤字(盈余)。上文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拉美国家的财政周期。

三、极化、宏观政策变动与社会冲突的理论与实例

如大量政治学和经济史的研究所述,拉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经历了快速广泛的城市化,而其政治也在此期间经历了巨大变化。地主阶级是政治精英核心,在拉美由来已久,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波城市为基础的政治领袖,他们获得了包含城市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政府公共部门雇员和城市边缘人群(例如非正规部门)多阶级的支持。因为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劳动密集型的非贸易部

门与资源密集型的出口部门分割严重,因此,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城市的实际工资。非贸易部门获利,初级资源拥有者受损。在这些群体持续和不断深化的分配利益斗争中,扩张政策在短期内,显然受到那些代表城市工人阶级选民的政府青睐。

(一)极化的宏观分析

考虑如下这个宏观经济模型,Sachs(1989)曾详细地阐述过这个模型。在一个典型的拉美国家,假设其经济中只有两个主要部门:基于初级产品的出口部门和以服务业、制造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其中许多制造商在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下生存)。[7] 非贸易部门相对于出口部门而言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并且除了劳动投入外,非贸易部门在其生产过程中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进口的中间产品投入。在出口部门,生产环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固定的生产要素(例如在阿根廷帕波斯草原的土地),这些固定的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在一些富裕家庭。我们假定出口部门也要使用非贸易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商品(例如运输)。

假定汇率在短期内固定不变,而且私人资本外流受到严格管制。在名义汇率固定不变期间,在购买力平价和给定这些商品的世界价格的假定下,出口商品的国内货币价格,以及非贸易部门进口投入品的价格都是固定的。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货币扩张意味着实际货币余额增加,国内利率降低以及内需增加。由于汇率是固定的,因此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仍然保持不变,内需增加推动非贸易商品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国内非贸易部门中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推高了名义工资,而更高的工资成本反过来进一步提高非贸易商品的价格。

因为构成非贸易品价格的因素包括工资成本和进口投入品的价格,后者价格并未变化,所以名义工资增加的比例将高于非贸易商品价格上升的比例。因此相对于非贸易品、进出口商品,名义工资增加。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货币扩张会导致实际消费工资(可支配工资)增加。同样的结果,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实际工资增加同时实际汇率也上升(其中实际汇率定义为贸易品的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的比率,并且升值意味着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下降)。

伴随实际汇率上升的还有几个现象。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格将会下降。根据出口部门使用非贸易品作为投入的程度,这个实际上升还会进一步挤压出口部门的利润,从而减少出口。出口减少将伴随着非贸易部门生产投入的进口需求增加,这将导致全面的贸易赤字。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出口商品是食品),出口商品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相对于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另一个预期实际消费工资(可支配工资)上升的因素。

实际工资和非贸易品产出增加。如果更高的实际工资刺激了家庭劳动供给增加,那么也同样提高了全面就业。出口部门的利润减少,由于出口部门资源所有权都高度集中在高收入阶级手中,因此关于利润压缩的政治分歧很少,甚至对于那些代表城市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而言,是有利的。然而,问题在于与扩张相伴随的贸易赤字,必须由外汇储备损失填补(或者如果国外债权人同意新的贷款,那就是不断增加的外债)。最终借贷能力和外汇储备都会枯竭。

除非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否则这种扩张会一直持续下去。当一个国家耗尽其为盯住汇率所需的外汇储备和借债能力后,名义汇率就会大幅贬值,一直贬到能够降低实际工资的程度,这时候出口盈利能力重新恢复,通过减少实际货币余额水平来减少国内需求,同时再次收紧信贷。扩张阶段带来的实际工资上升又重新回落,由于没有外部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国内的贬值必须一直持续到恢复贸易平衡为止。通过扩张,实际工资下降的幅度一定大于初始实际工资上升的幅度。

在民粹主义周期的最后阶段,为了防止实际工资的崩溃,政府经常在工资和控制物价间摇摆不定。伴随着汇率管制,价格管制导致黑市,使得短缺和价格溢价被隐藏。在价格扭曲变得无法忍受时管制最终会被取消。但是在此之后民粹政府很可能转向更加极端的措施,例如 1982 年墨西哥和 1987 年秘鲁采取的银行国有化措施。

表面上看,似乎实际工资增加的紧迫政治压力是政策制定者青睐这种扩张政策的原因,而实际上是

轻率的策略。进一步来说，只有当非贸易部门的利益在政治上压过贸易部门，并且整个社会没有关于两个部门之间分配的基本规范时，扩张政策才是有吸引力的。换句话说，只有非贸易部门的代言人掌握政治权力，并且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配利益斗争时，这种扩张政策是最受青睐的。

那些出口部门多元化，或者拥有政治重要性的进口竞争部门（不完全受贸易壁垒保护的）国家，最有可能拥有强烈反对实际工资上涨的政治选民。以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农业部门来说，数以百万计的小农以其绝对数量的优势而拥有政治权力。如 Sachs（1985）所言，拉美的农业部门似乎更多的是掌握在农村寡头手中，而亚洲国家则不同。[8]

（二）拉美极化引发宏观政策变动的实例

以 1946 – 1949 年的阿根廷为例来分析。胡安·庇隆从 1943 年的军事政变开始自己的政治崛起之路，此次政变推翻了自 1930 年军事政变后掌权的保守派。旧政权以保守为中心，以农业为重，民族主义和狭隘的运动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推翻了旧政权。在 1946 年总统选举获胜之前，庇隆最初是新政府的劳工顾问，此后相继担任劳工决策人、作战决策人、副总统。庇隆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培养自己的政治基础，因此为他的总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担任劳工决策人期间，他因其在社会保障福利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工资福利体系和提高最低工资等方面的显著扩张而闻名。CGT，作为最重要的劳工组织，其势力增长迅速，并且强力支持庇隆竞选总统。

庇隆在 1946 – 1949 年间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城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政策的典型。财政和货币支出高度扩张，根据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被严重高估，维持在一个固定的名义水平上。由于扩张政策和政府对 GCT 工资协商的直接支持，实际工资上涨。在关税壁垒下，为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实行高度贸易保护政策。分配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即在提高城市工资的同时，为上升中的城市部门利益而挤压此前农业寡头的利润。GNP 中工资收入的份额从 1946 年的 38.7% 上升到 1949 年的 45.7%，实际工资在这三年中增长了 62%。繁荣的尽头其实早在 1948 年就已经显现出来，农业产量开始下降，外汇储备减少（从 1946 年的 11.8 亿美元下降到 1948 年的 2.58 亿美元），通胀加速，GNP 在 1949 年下降了 4.5 个百分点。

1952 年，当庇隆最终转向一个更加正统保守的经济策略时，他坦言了自己初始计划的政治和社会动机。Mallon andSourrouille（1975）摘录了庇隆在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正义党（例如，庇隆主义）坚持认为，一个经济的产出首先应当满足居民的需求，剩余的才用于出口，仅此而已。按照这种理论，今天在座的男孩子们，吃的多消费的多，因此剩余少。但是这些可怜的家伙们已经被忽略了将近五十年了，正是这个原因让他们吃穿用、消费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整整五年。但是现在，毫无疑问，为了不再浪费更多，我们必须重新安排一些事情。”[9]（p12）

庇隆当政期间的阿根廷和瓦加斯当政期间的巴西，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城市、多阶级基础；在城市工人阶级参政权扩张基础上，通过选举竞争获得权力；充满魅力的领导阶层；在通过改善分配、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着重从国家行动的层面上吸收工人（Drake，1982）。[10]（p218）有趣的是，这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继任者往往更多地依赖分配政策而不是再分配政策。例如他们往往寻找各种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方法，而不是诉诸于更明确的税收政策或者直接没收高收入阶级的财产。对高收入阶层税收的忽视，有时候是由民粹主义领导人及其继任者的秉性导致的，但有时候则仅仅是民粹领导人缺少实施新累进税的政治实力。

赫尔南多在《另一条道路》中，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实例，揭示了秘鲁存在一些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组成政治或经济团体，对政府施加影响，以便在财富、资源和权利的再分配中，为他们自身或成员争取有利地位。由于这些团体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他们彼此之间不断竞争，确保立法和政策对自身有利。最终，国家的立法机关把整个社会阶层变成只具有少量民主色彩的“压力集团”。企业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同政治家和市政当局建立亲密关系上。[11]（p221）

秘鲁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但由于这些压力集团的存在，始终缺少一种共同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目

标,因此经济政策缺少一致性和连续性。政治家们对国家资源实行再分配,希望产生理想的效果,但这种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使他们的愿望最终均未能实现。由于总统离任时候都不得人心,所以继任者们一上任,就被迫推行改革措施,所以,所谓的任何"国家政策"或"国家项目"都难以继续执行。政府政策和目标缺少一致性,大大削弱了重商主义的体制,某些极端化政策大行其道,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权威性,也缩短了人民能够给予新政府的宽限期。

(三)拉美宏观政策变动引发社会冲突的实例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模式,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这些制度对增长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制度的存在使得 20 世纪的拉丁美洲和 19 世纪一样,各种集团为了争权夺利,陷经济于停滞、政治于动荡、国内于不安定。1910 年爆发墨西哥革命,随后 1952 年玻利维亚革命、1959 年古巴革命、1979 年尼加拉瓜革命。同时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也激起了绵延不绝的内战。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业革命。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是拉美国家的主要特征。虽然伴随着这一过程,拉美人民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1990 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成为民主国家,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仍然处在动荡和不安之中。因此政府更迭频繁是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的一大特征。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另一大特征是新兴产业和传统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矿业和农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前者希望扩大国内市场,要求保护新兴产业;后者则希望保持经济开放,巩固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拉美城市化快速发展前期,在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背景下,以工业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工联盟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迅速发展,但是拉美城市化的工业经济基础却十分脆弱。拉美内向型工业化囿于资金短缺和技术薄弱的限制,高度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资本和中间产品,高依附性意味着高经济风险,高经济风险意味着政治风险,缺乏本国雄厚工业基础支撑的民粹主义引发了拉美的经济危机。

但是统治精英认为,民粹主义引发了国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衰退,容忍民众参与政治的代价超过了排斥民众参与的代价,因此需要通过高度镇压性的独裁政府来控制民众过高的福利要求。于是拉美政权普遍发生了从民粹主义体制向威权体制的转变,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威权政府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减少民众的经济分配,以加快资本积累、吸引外资并深化工业化进程。

但文人政府和军人政府的轮流执政和频繁的政变难以创造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政府制定的许多适宜的经济政策因政权更迭而被废弃,这造成政策缺乏延续性。政策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可能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政策的不稳定性也影响到了国内经济增长。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有两个目标一致但偏好不同的决策者联合制定财政政策。为某一特定人群(或部门)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是每一个决策者获得效用最大化的途径。假设这两个决策者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有不同的公共物品偏好。这两类群体可以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制造部门和传统部门、城市和农村、两个政党、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也可以是两大民族等等。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甚至可以是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国家公共部门和非公部门。

本文中明确区分了决策者采取个人理性但社会非理性政策的情况:偏好的极化。偏好的极化与过度开发共同资源正相关(极化效应)。如果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严重或者决策者个人的贴现率非常高,那么面对税收冲击,政府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的比例相较于税收变化规模会更大。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的剧烈的财政赤字、周期性的财政波动以及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从历史角度证明了本文的结论。本文认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同经济社会群体或者政府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常常用来衡量极化程度,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正是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时期,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拉美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为其实行激进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正当的

理由，大规模提高预算，打破贸易平衡，短期内实行高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政府强势介入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而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地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爆发货币危机。这不仅无法改善穷人的生活，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痛苦之中。劳动冲突增加且不断升级，最终可能演变为大规模社会冲突事件。而如果在巨大的社会冲突压力下走上错误的、失败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对中国而言，当前也面临这种两部门极化现象。例如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中先进的工业部门与相对停滞的农业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曾经是最严重的冲突来源。工业化本身要求政治稳定，可是工业化的代价又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这本身又构成了对政治稳定的一个威胁，进而也威胁到了工业化政策的连续性。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本身连同它给农民带来的压力年复一年地增强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土地冲突。而只有改善农民的境况，缩小两部门之间分化程度，才能有助于缓解紧张局面。同样，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任何劳资冲突，都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具有政治冲突特征的形式，因为劳资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需要政府干预才能平息。另外，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存的双轨制经济，使得劳动力市场存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就业，两大部门之间不仅存在工资差异，享受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更是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双轨制不仅制约着整个社会深化改革的一致性，也是造成整个国家社会矛盾、阶层对立的根源。[12]

因此努力降低社会不同群体的分化程度、保持国家政治稳定，防止任期不确定性情况发生，不仅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方法。

参考文献：

[1]〔美〕奥尔森.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与社会僵化 [M]. 吕应中，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丹尼斯·缪勒. 公共选择理论 [M]. 杨春学，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Jaejoon Woo. Social Polarization，Lndustrialization，and Fisc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72).

[4] Jaejoon Woo. Social Polarization，Fiscal Instability and Growth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5，(49).

[5] Rodrik，D.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6，(1).

[6] Gavin，M.，Perotti，R. 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A]. *In Bernanke，B. S.，Rotemberg，J. J.* (*Ed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M]. Cambridge，M A: MIT Press，1997.

[7] Jeffrey D. Sachs. Soci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J]. *NBER Working Paper*，1989，(2897).

[8] Jeffrey D. Sachs，John Williamson，External Debt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J]. *B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1985，(2).

[9] Mallon，R. and J. V. Sourrouille.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a Conflict Society*: *the Argentine Cas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0] Drake，P. W. Conclusion: Requiem for Populism? [A]. in M. L. Conliff(e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2.

[11]〔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 另一条道路 [M]. 于海生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2] 田艳芳. 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经济制度肇因与风险化解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

(责任编辑：郭荣华)